

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与中国图书馆学研究

——对中国图书馆学反本质主义批判的理性思考

刘 君

摘 要 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整体上并不存在“后现代”意义上的所谓“本质主义”,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受意识形态和制度权力制约的把某种特定理论观点作为“中心话语”去贯彻的“本质化”意义上的“本质主义”。批判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存在“本质主义”思维的学者,其实是把图书馆学理论受时代和文化制约的“可变性”的历史状况,与人们借用“意识形态”、“权力”等对某种理论观点的“真理化”、“本质化”的超稳定干预相混淆了。而后现代主义学者之所以有这样的误判,除了与近代以来中国特殊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以及研究者对后现代理论的机械套用有关之外,也与本质主义同意识形态具有诸多内在的一致性有关。可以认为,源于人文艺术领域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尽管它的某些观点可能对图书馆学研究有所启发,但由于它不是一种相对成熟的理论,也不适于当代中国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发展需要,因而不能作为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应然指向”。参考文献 74。

关键词 图书馆学 本质主义 反本质主义 后现代主义 本质化行为 政治意识形态

分类号 G250

Essentialism, Anti-essentialism and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in China: Reflection on Anti-essentialism Critics on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Liu Jun

ABSTRACT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as a whole, there has not been the “postmodern essentialism”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reason, but there has been to some extent the “centralizing essentialism” dominated by political ideologies and powers, which means that a particular point of view of library essence is taken as a central discourse or absolute truth in particular periods. The critics of essentialism in the research on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actually confused the historical “variability” of library science theory caused by the limit of the times and culture and the improper intervention of theoretical centralization or essentialization by the political ideology and power, and the reasons for this mistake include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research and politic ideology in China in modern times, and the mechanical usage of the postmodern theory by library researchers as well as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of essentialism to ideology. Finally,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at the post-modernism originating from the humanities and arts cannot serve as the orient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despite its certain ideas are inspiring to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because it is not only imperfect but also unsuitable for the need of library and library science of contemporary China. 74 refs.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Essentialism. Anti-essentialism. Post-modernism. Essentialized behavior. Political ideology.

通讯作者:刘君,Email:junliugz@126.com

1 引言:中国图书馆学的反本质主义批判及提出的问题

后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全球哲学文化中的一股重要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引入中国。继早期普及性的翻译、介绍和评价,进入21世纪之后,又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中国问题”相结合而展开讨论,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激起了强烈震荡,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图书馆学领域,自2004年廖腾芳发表《构筑哲学基础上的后现代图书馆》一文^[1]以来,后现代主义日益受到中国图书馆学研究者的关注,不少研究者采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图书馆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分析 and 探讨。研究内容也从图书馆建设与发展^[2-4],图书馆价值与功能^[5-7],图书馆服务^[8],后现代阅读^[9],信息素养教育^[10],图书馆职业^[11-12]等专题领域,逐渐深入到图书馆学的本质论、认识论、方法论等事关当代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的诸多理论问题^[13-16]。而在这一“后现代思潮下的理论研究”(刘兹恒语)中,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反本质主义批判因其在“后现代图书馆学”中的基础性与前提性地位,而成为颇受关注并引起争论的重要问题。这一批判以傅荣贤在2009年发表的《论当代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一文为先声,该文以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理论观点为依据,对图书馆学的知识生产模式和思维方式进行了反思与批判^[17]。此后,蒋永福先后在2009年和2010年发表了《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品格》、《不再追问本质:图书馆学理论的后现代走向》两篇文章,在对“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及其后果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对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未来走向作了概括性描述,这在一定程度上已具有理论宣言的意味^[18-19]”。总体上看,反本质主义批判的主要观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认为现代图书馆学研究是“本质主义”的,并由此造成了诸多弊端和严重后果。如傅荣贤认为:“德国学者施莱廷格于19世纪初提出‘图书馆学’的社会背景是欧洲工业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传统社会的重组,学术背景则是欧洲启蒙运动以来自然科学理性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延伸。……相应地,在图书馆工作与研究中,必然追求内容和过程的确定性,并追求结果的标准化。这决定了西方学者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理解无论是在历史向度上抑或是在现实层面上,都与西方‘本质主义’的认识方式不谋而合。”^[17]蒋永福认为:“在现代性视野中,图书馆学理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就在于其能够揭示和确认图书馆的本质,而这一本质就在于研究对象的准确认定上。长期以来,‘界定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揭示图书馆的本质’的逻辑,顽固地支配着无数学者的思维路向。……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一种‘说’能够得到学界大多数人的认同或赞许。”“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问题出在思想方法上,即对现代性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思想方法的盲目崇信。”蒋永福认为,“对图书馆现象的‘始基’或‘本质’”的“元叙事制造”,使“图书馆学中的‘本质说’、‘理论体系说’不断被生产和泛滥”,“诱导着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兴盛”,导致了价值上的“一元主义”、话语“霸权”、真理“垄断”和“(思想)专制”等“危险的”后果,是现代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弊端^[18-19]。

其次,质疑甚至否定图书馆本质的实际存在,认为图书馆本质追问缺乏应有的正当性。如傅荣贤认为^①:“图书馆学本质的‘为道屡迁’,虽然有时空转换的辩护,实质上却缺乏足够必要的正当性。”“就中国语境而言,对图书馆学本质的每一次革命性的探索,往往构成了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历程中的一个个崭新坐标。……然而,各种本质观不仅在语义层面难以达成和解,而且在哲学本体层面上也无

① 需要指出的是,在傅荣贤的论述过程中,“图书馆本质”、“图书馆学本质”、“图书馆学研究的本质”经常是混合使用的。从逻辑学上看,“图书馆本质”、“图书馆学本质”、“图书馆学研究的本质”是三个内涵完全不同的概念,但从傅荣贤的论述对象和具体内容来看,他所谓的“图书馆学本质”其实是“图书馆本质”,“图书馆学研究的本质”指的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本质”或“图书馆本质”。本文在引用中以忠实于作者的原文表述为原则。

法取得一致。关于本质问题的这种‘迄无定论’,不禁令我们怀疑图书馆学研究的本质是否真的存在。”^[17]蒋永福进一步提出:“图书馆现象并非自然现象,它的所谓‘本质’其实是人的主观建构的产物,而并非它本身所固有的东西。”“人们以界定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的方式来追问图书馆的本质的努力,其实并不是在‘发现’本质,而是在‘制造’本质——即在制造乌托邦式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s)。”而“图书馆的本质是一个无法用‘元叙事’方式确定的东西。这种永远不可确定的东西,与其说它客观存在,不如说它‘没有’!”^[18-19]

最后,认为中国图书馆学应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从本质主义转向反本质主义”,并“彻底摒弃本质观”、“不再追问本质”。如傅荣贤认为:“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作为对现代主义质疑、反思和批判的一种新的认知范式,认为差异、多元、开放和不确定是世界的基本特征,这对包括图书馆学在内的几乎所有学科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导致了学术研究范式的深层转换。……就图书馆学研究而言,应该摒弃寻找本质和规律并致力于证成它们的研究思路,解构某些预设的‘给定’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先在性地位,从而彻底否定先验的各种‘给定’对人们思想认识的束缚。”“总之,在后现代哲学家已经‘用一个未知的、不确定的、复杂的、多元的世界概念取代了传统的给定的世界概念’的今天,我们不是要对‘到底什么才是图书馆学研究的本质’做修修补补式的‘后出转精’,而是要彻底摒弃本质观,转而面向当下、具体、真实的图书馆现象,从而使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工作展现出多元化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17]蒋永福则声称,那种“制造‘元叙事’的努力该到终结的时候了。”“放弃对‘元叙事’的制造,不再追问虚幻的图书馆‘本质’,摆脱对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盲信,摒弃理性主义一元论的束缚,……是图书馆学理论应然的后现代走向。”^[19]

对上述反本质主义批判的主要观点,一些学者在文中作了回应或提出了质疑,徐跃权 2010 年在《论图书馆本质的哲学解构与建构》一文中指出:“探索本质是人类认识发展必然经历的一个过

程,对其意义的认识应该持辩证观。”“轻言本质或否认本质,恰恰暴露出我们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问题。”徐跃权认为:“应该摒弃的是在图书馆本质问题上的经院哲学的思维方式,代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和实践观。”^[20]马恒通 2010 年在评介蒋永福的《图书馆学通论》一书时,对书中“反本质”、“反基础”等观点存在的逻辑矛盾提出了质疑,他说:“蒋先生用 2700 多字阐述‘图书馆学的定义’,这其实也是在讲‘本质’,因为‘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定义’是讲‘本质’的,你不是在‘反本质’吗?为何还讲‘本质’?……蒋先生赞同‘反基础’,为什么《通论》还用一万多字写‘图书馆学理论基础’?……《通论》说‘信息、知识、文献是展开图书馆学理论的概念基础’,这不也在讲‘基础’吗?”^[21]邱景华 2011 年发表的《后现代理论与中国图书馆学》一文则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对蒋永福“后现代图书馆学”中的若干理论误读作了深入分析和探讨,认为“蒋永福建构‘后现代图书馆学’所采用的不是后现代的思维和方法,而是线性进化论的旧思维模式,以新代旧,犯了用‘一个中心’代替另‘一个中心’的错误。”^[15]王子舟 2011 年在《建国六十年来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一文中说道:“近几年部分研究者撰文以后现代理论为利器对现代图书馆学进行了反省与批判。他们倡导学术多元化,反对一元化,消解理论的宏大叙事,重视地方性知识的作用,肯定事物发展的不确定性,这些观点给图书馆学界吹进了清新之风。但是,其中某些观点也与他们秉承的原则(多元、宽容)时有抵牾,如指斥探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伪命题,鄙夷对图书馆本质的研究等,不经意间流露出批判者自身现代性传统的局限。”^[22]王子舟认为:“从学术传承的角度看,前现代的启蒙思想、现代的普遍理性,其中的一些内容在后现代都有存在与继承价值”,何况“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基本上还处于‘现代’阶段”。“思想是没有国界的,观念的传播像风卷云舒。然而现实是有国界的,现实的转变与进化远比思想慢得多。只有对现实起到化学反应的思想,才能扣住时代精神,满足现实界域的渴

望。”^[22]刘兹恒和周佳贵 2011 年在《论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科学化》一文中评析“后现代思潮下的理论研究”时则这样写道：“今天的图书馆学理论发展确实出现了一些后现代特征。如‘研究对象’虽然被研究多年仍无法确定,使人不得不怀疑其是否存在;而构建理论体系的‘元叙事’思维总是把理论研究引向一个封闭的境地,并且理论体系也不止一种。但我们认为,这些只是表面的现象,而研究者们对这些现象的评述更像是后现代思想套用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领域而缺乏实质的分析。虽然‘研究对象’现在不能确定,但它并不代表未来就不可以;学科理论体系现在没有形成,有可能是理论研究的策略存在问题。这种把真理绝对主观化的思维其实是在消解科学研究的意义。科学研究真是无效的吗?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因为人类依靠科学取得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否认理性的作用就等于抽掉了科学研究的基础。况且,从对现代主义进行反思的背景看,对后现代主义的选择何尝不可以看作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呢?”^[23]刘君 2012 年在《图书馆本质:“实存”还是“虚构”?》一文则对后现代学者的图书馆本质“虚构论”作了批判性的分析,认为“虚构论”不仅在立论上缺乏应有的逻辑依据,而且自身也具有明显的“虚构性”,并对图书馆本质的客观实在性作了初步论证^[24]。在《为何追问本质:图书馆本质追问的正当性辩护》一文中,又对图书馆研究中本质追问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作了初步的论证与阐释^[25]。

应当说,这些回应大多是中肯的,但由于论者大多并非专文对后现代反本质主义批判进行分析和探讨,因而未能对自己的观点做出充分的论证与展开,特别是对后现代主义学者据以提出这些观点的前提或理论预设,尚未进行必要的追问。然而,前提和预设其实是更为深刻的研究层面,因为任何理论观点,无不是从一定的前提和预设出发,经由一定的分析论证与逻辑推演而得出的。其次,因篇幅所限,他们对自己的质疑和观点仅限于概略地陈述,因而同样存在着刘兹恒先生所说的缺乏实质性的分析和论证的问题。然而,学术的重心不在“观点”而在“分析论证”。任何理论观点,都“必须有

逻辑(logical)和实证(empirical)两方面的支持”才是科学可靠的^[26]。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是否存在后现代学者们所谓的“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是否意味着应“彻底摒弃本质观”、“不再追问本质”?后现代主义是否是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应然走向”?这些问题,既是反本质主义批判本身提出的尚待解答的主要问题,也是事关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合法性及其价值评判的重要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些问题给出“实质性的”、令人信服的回答,那么,中国图书馆学中的这场后现代反本质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很可能还会进入一种理论的“再批判”、“再反思”状态。

2 中国图书馆学是否存在“后现代”意义上的“本质主义”?

“本质主义”是伴随后现代“反本质主义”的诞生而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学者认为,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是“本质主义”的,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然而,他们在立论时并没有结合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实际状况进行过“实质性的分析”。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存在后现代意义上的所谓“本质主义”吗?

要判断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是否存在后现代意义上的“本质主义”,首先必须对后现代意义上的“本质主义”进行必要界定和描述——哪怕这种界定和描述是“个人化的”。这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言,当我们要言说一个对象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它是什么。英国著名分析哲学家乔治·爱德华·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在《伦理学基础》序言中也指出:科学研究之充满其历史的困难和争论,主要是由于一个十分简单的原因,即人们没有首先去精确地确定他们所想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就试图作答^[27]。然而,对于后现代主义学者来说,却是不能追问本质主义“是什么”的。因为有关“是什么”的陈述,必然要以一定的本质观念为基础,而后现代主义学者认为事物是“没有”本质的。这正是后现代主义学者言说中

的一个悖论。尽管如此,我国图书馆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学者仍对“本质主义”作了必要的界定和阐述(尽管这恰好证明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仍是“本质主义”的)。如傅荣贤说:“本质主义‘是一种先在地设定对象的本质,然后用此种本质来解释对象存在和发展的思维模式’。在西方,本质主义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念哲学,而笛卡儿、康德等人的二元论哲学思想则成为本质主义的经典注脚。人们相信,世界上一切现象、一切表现都有一个最终的、可靠的、实体性的‘本质’作为基础。西方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集中反映了本质主义的一般特征,即:肯定纷繁芜杂的大千图书馆现象背后存在一个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本质,揭示了图书馆的本质也就意味着抓住了各种图书馆现象背后的规律。因此,从图书馆现象归纳图书馆本质,再从图书馆本质演绎图书馆的一般理论、原则和方法,便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模式。”即“西方‘本质主义’的认识方式”^[17]。蒋永福说:“按照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思想方法,图书馆现象如同自然现象——图书馆现象的产生必然基于某种‘始基’,图书馆现象中必然存在某种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本质。”并解释说:“所谓基础主义,就是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一种‘起源(origin)’和‘基础(foundation)’,这种起源和基础决定该事物具有一种永恒不变的性质。坚信在事物运动变化的背后有一种永恒不变的东西——逻各斯(道)。”而“本质主义则认为,某一事物之所以如此这般表现和发展,肯定是由其内在的本质所决定的,所以,只要发现这种本质,就可以完全把握和驾

驭该事物的发展规律。”^[18-19]结合他们的其它论述并作一对照,可知这些观点主要是西方后现代“反本质主义”理论观点的引用和演绎。例如美国著名分析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后哲学文化》中就把“本质主义”概括为:所谓“本质主义”,乃是这样一种僵化的、封闭的、独断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模式。在本体论上,本质主义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本质而是假定事物具有唯一的、普遍的永恒本质,这个本质不因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知识论上,本质主义设置了以“现象—本质”为核心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坚信绝对的真理,热衷于建构“大写的哲学”(罗蒂)、“元叙事”或“宏伟叙事”(利奥塔)以及“绝对的主体”,认为这个“主体”只要掌握了普遍的认识方法,就可以获得超历史的普遍有效的知识^[28]。

在明确了本质主义的内涵和特征之后,笔者拟对近百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代表性人物的本质观念进行认真考察,以判断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是否存在后现代主义学者所说的“本质主义”问题。为保证对象样本的代表性、权威性,本文以范并思等人完成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20世纪的图书馆学:重要文献、人物、流派的德尔斐法测评》的专家调查结果为基础,并适当考虑近十几年来对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做出的新贡献,确定了自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确立以来对图书馆本质问题作过研究的14位代表人物^①。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尽管这些代表人物大多都没有对自己的本质论立场作过专门阐述,但从他们的图书馆本

① 范并思等人2003年完成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20世纪的图书馆学:重要文献、人物、流派的德尔斐法测评》的调查专家包括: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四届、第五届学术委员会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组全体成员,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五届学术委员会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成员,以及具有海外图书馆学博士学位的人员共计22人,可保障测评结果的权威性、可靠性。该专家测评结果显示,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代表人物共计64人。“主要活动领域或贡献”包含“图书馆学理论”的有杜定友、杨昭愬、戴志骞、李小缘、沈学植、陶述先、刘国钧、李景新、俞爽迷、喻友信、钱亚新、陶孟和、黄宗忠、周文骏、吴慰慈、宓浩、黄纯元、张晓林、马恒通、蒋永福、霍国庆、徐引麓共计22人(范并思. 20世纪西方与中国图书馆学——基于德学斐法测评的理论史纲.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第329-351页)。而在这22人中,又有杜定友、杨昭愬、刘国钧、黄宗忠、周文骏、吴慰慈、宓浩、黄纯元、马恒通、蒋永福、霍国庆和徐引麓12位学者对图书馆的本质或定义问题作过专门探讨。本文增列了王子舟和于良芝,他们两人分别因《图书馆学基础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图书馆学导论》(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及若干高质量的理论文章而广受赞誉,成为我国图书馆学界公认的21世纪初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

质探讨及相关论述中,仍可管窥其背后蕴含的图书馆本质观念,现简述如下:

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对图书馆的本质问题多有论述。1921年他在《图书馆与市民教育》中认为,图书馆是一教育化及社会化之机关,是公共的、开放的。中国古代藏书史已有数千年,但图书馆与古代藏书楼之区别并非在名词上,而是在实际内容上,即“以其用意之不同,管理之各异,遂有新旧之分。”^[29]^[22]在1925年出版的《图书馆通论》和1927年出版的《图书馆学概论》两部专著中,杜定友的图书馆本质观念已有很大的发展。在对“图书馆”的诠释上,已从辨别新旧图书馆异同的角度转移至学术理性上来。因为此时近代图书馆运动在国内已蓬勃发展,近代图书馆之知识、观念也开始浸润社会的思想文化,杜定友意识到,作为图书馆本质的阐述,或者说作为一个带有定义性的判断,仅仅从近代图书馆的特征入手,自然尚显不足^[29]^[20-21]。为此,他对图书馆的构成要素作了分析,以揭示图书馆的基本原理和本质特征,提出了“整个图书馆事业,其理论基础实可称‘三位一体’:一为‘书’,次为‘人’,三为‘法’,三者相合,乃成整个之图书馆”的新观点,并特别指出:“此理论成立甚早;惟因理论与事业随时变迁,故此理论中心乃由转移。”^[30]

刘国钧先生1921年在《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一文中对图书馆的性质问题作了专门探讨,认为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可以三语括之,即“自动”,“社会化”和“平民化”^[31]。1930年刘国钧写成《图书馆学要旨》,为图书馆下定义曰:“图书馆乃是以搜罗人类一切私心与活动之记载为目的,用最科学最经济的方法保存它们,整理它们,以便利社会上一切人使用的机关。”^[32]和杜定友一样,刘国钧的这个定义也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搜集保存“人类思想与活动之记载”;二是“用最科学最经济的方法”整理之;三是“便利社会上一切人使用”。不难看出,刘国钧的“三个层次”与杜定友的“三位一体”是基本吻合的,而从《图书馆学要旨》各章所列的参考文献来看,也都有杜定友先生的著作。这说明,刘国钧先生不仅在图书馆性质的认识上是发展

的,而且在学术研究中还保持一种开放吸收的理论态度。

杨昭愬先生192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的第一章即为“图书馆的定义”,他指出:“考求图书馆在西洋的原文,在英国是Library,是从拉丁的Liber来的,有书籍的意思。在德国是Bibliothek,在法国是Bibliotheque,都是从希腊的Βιβλιον和Βιβλιοθηκη来的,前面的字是书籍的意思,后面的字是地方的意思,合两字为一字,确有书籍地方的意思。那么我们说图书馆是藏图书之馆,也不算大错。不过这个名词是很旧的,现在他的名词虽然未改造,他的概念却是变迁了。我们要知道名词是无自性的东西,概念虽然变迁,名词可以仍旧不改。不过我们对于他现时所含的意义究竟不可不明白,不然就要生出以辞害意的毛病,不可不注意!”^[33]杨昭愬先生提醒我们不仅要深刻地理解语词(“名”)与概念(“实”)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要认识到图书馆是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的,因而反映其本质属性的概念,也具有历史的相对性。

黄宗忠先生关于“图书馆是什么”的回答,从早期(1963年)的“图书馆是一种专门搜集、整理、保藏宣传、流通图书的机构”^[34],到中期(1988年)的“图书馆是文献信息的存贮与传递中心”^[35]^[17],再到晚期(2003年)的“(图书馆)是通过人工或计算机、网络对实体或虚拟的信息、知识进行收集、积聚、组织、整理、存贮、选择、控制、转化、传播并建立检索点,供读者检索、利用的信息空间或物理场所或虚实结合的复合体”^[36],本身即表现为一个不断发展与深化的过程。而他在《图书馆学导论》中提出自己的图书馆本质观点后也不忘强调:“我们研究图书馆学就要注意对相关概念进行研究,特别要重视理论基础——共同本质的研究,这将给我们以新的启迪。”黄宗忠认为:“图书馆是一个运动和发展着的整体”,是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的,只有不断地进行新的研究,方能“给我们以新的启迪,为科学地解决图书馆学领域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提供依据”^[35]^[27]。

周文骏先生1983年在《概论图书馆学》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文献交流说”,二十五年后他在《什

么是图书馆?怎样研究图书馆学?》一文中作了新的发展,提出:“图书馆是文献和信息资源社会共享的机制、信息技术应用和创新的平台、文献和信息资源交流的枢纽。”^[37]2010年,他又在《图书馆是社会的产物》一文中“尝试对图书馆产生和发展问题作社会视角的考察”,认为“图书馆出现是人的本质精神的体现。人的本质决定着图书馆的本质及其发展。”^[38]周文骏先生说:“平时,我脑子里头考虑得最多的问题,恐怕要算‘什么是图书馆’了。……图书馆在不断地向前发展,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应该与时俱进。”^[38]他在与杨晓骏合著的《论文献的属性、现象和本质》一文中也说道:“人们认识事物都是先从现象入手,从而发现事物的本质,这是认识运动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发展,但这种认识运动是不会终止的,而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即由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由不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过程,从而不断地发现真理和发展真理。”^[39]

吴慰慈先生对历史上有关“图书馆是什么”的各家观点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他在1985年与邵巍合著的《图书馆学概论》中说道:“这些代表性观点,强调的都是图书馆的质的规定性的一个方面或某些方面,而对其它方面有所忽略。所以,作为图书馆概念的表述,都是有一定的缺陷的。它们的意义,就在于为我们认识图书馆的实质,提供了多种角度。”吴慰慈认为:“图书馆的形态是在不断变化的。图书馆的概念也在发展、变化,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因此,对于图书馆我们还要进行再认识。”^[40]在2004年出版的《图书馆学概论(修订二版)》和《图书馆学基础》中,吴慰慈又说:“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图书馆本质)并非不证自明和一成不变的。”一方面,“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图书馆现象本身具有认识上的复杂性,而研究者们却往往站在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对这一现象加以认识。”另一方面,“作为人类社会产物的图书馆现象本身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必然会随着图书馆形态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和变化。”而正是这种“对象的不断变化”和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入”,“促使图书馆学理

论不断发生新旧更替并逐渐完善。”^[41-42]

宓浩先生1986年在《图书馆学原理》中以著名的“知识交流说”为基础建构了图书馆学的内容体系,但他在后记中不忘写道:“任何教材都是一定历史时期内的认识产物,总有其历史局限性。美国图书馆学家巴特勒曾经希望他的著作的内容尽快地落后于时代,我们同样抱着这一强烈的愿望。”^[43]宓浩先生的这段话,“实际上成为要求他的学生继承他的批判精神,继续他的理论探索的‘遗言’”^[44]。作为宓浩先生的学生和助手,黄纯元直接参与了“知识交流说”的创立,他在2003年发表的《追问知识的本质——对知识交流论的再思考》中说:“和谢拉的社会认识论一样,宓浩的知识交流论也只是提供了一种认识的框架,仍然还是一种理论假说。正如社会科学的容许复数的解释存在一样,知识交流论也不可能是唯一的解释。因此就其理论本身而言不仅需要进一步的充实,而且还不排斥有待进一步扬弃、修正甚至理论重构的地方。这并不是对宓浩的研究工作的否定,而是延续宓浩中断了的研究工作,深化这一问题的探索。”^[44]

徐引箴和霍国庆在1999年出版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中提出了图书馆本质“信息资源说”,然而他们认为,不仅“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事物的本质本身也在逐渐地发生着变化”。在该书的前言中,他们也表达了和宓浩先生相同的学术态度:“怀着与巴特勒当年同样的心情,我们希望我们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尽快过时、尽快被新的理论所取代。”^[45]。

于良芝认为任何“概念定义”都是历史的。在200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导论》中,她把自己关于“图书馆是什么”的回答称为“一个临时定义”。并且解释说:“图书馆这一社会现象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任何定义只能反映一定时期的‘图书馆’概念的含义”,她的定义“也不例外”^[46]。

王子舟的图书馆本质研究,体现在他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中。因为在他看来,“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从其研究客体的活动中概括、抽象出来的。”^[47]^[84]在200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基础教程》中,王子舟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图书馆本质“知识集

合论”,而在2008年出版的《图书馆学是什么》中,还明确声称他的“知识集合论”是“本质主义的一种视角”^[48]。然而,王子舟对其他各家观点仍持一种理解、包容、历史与辩证的态度,认为这些认识“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并且说:“在图书馆学发展的两百年历史之中,中外各国有关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包括图书馆本质)的表述有数百种。虽然这些认识受不同时代的文化影响,有着不同时代的文化烙印,但它们都含有科学探索精神,就像不同时间里撒下的理性种子,每一粒都蕴含着宝贵的思想价值。”“每一次认识的深化都对图书馆学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47]⁷²

上述12位代表人物的本质论述及其蕴含的本质观念,其特征可概略地归纳为四个方面:①“图书馆是一个运动和发展着的整体”,是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的,“对它的认识应该与时俱进”,需要“不断地进行新的研究”(杜定友、黄忠宗、周文骏、吴慰慈)。②“事物的本质本身也在逐渐地发生着变化”(徐引篪、霍国庆),反映其本质属性的概念也具有历史的相对性,任何图书馆定义都只是“一个临时定义”(杨昭哲、于良芝)。③“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周文骏、黄忠宗、吴慰慈、黄纯元),“受不同时代的文化影响,有着不同时代的文化烙印”(王子舟)。④没有绝对的真理,真理(理论)是“发展”的、“开放”的(刘国钧、周文骏、吴慰慈),“理论与事业随时变迁,故此理论中心乃由转移”(杜定友),因而“不仅需要进一步的充实,而且不排除有待进一步扬弃、修正甚至理论重构的地方”(宓浩、黄纯元)。显然,这些本质观念与后现代哲学“本质主义”的内涵、特征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反的。

当然,也有个别代表人物的图书馆本质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后现代学者所说的“本质主义”的特征,例如马恒通2009年在《“研究对象”之争源于仍未准确揭示其“本质”》一文中认为:图书馆本质是“微观的、固有的、稳定的和惟一的,它不会随时空变化、图书馆形态变化而变化,也不会随外部条件变化而变化,更不会随人们的视角的不同和认

识的变化而变化,所变化的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和人们对图书馆认识的变化。”“一个事物的本质是不变的,图书馆学所研究的事物应当有一个先验的本质(即不变的本质),不能因为‘自图书馆学诞生以来,人们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和认识就千差万别’而否认事物本质的固定性、先验性。”^[49]然而,从马恒通图书馆本质探讨的理论来源看,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他引用《辞海》、《现代汉语词典(修订三版)》等国内权威工具书(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权威工具书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笔者注)中的本质概念说:“‘本质’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的根本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由事物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构成。”引用毛泽东的《矛盾论》说:“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而他的“现象与本质……二者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任何事物都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等论述^[50],也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然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却是“反本质主义”的(对此下文探讨)。马恒通以“反本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本质观为基础,却演绎出具有后现代哲学“本质主义”特征的本质观点,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本质观的误读。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本质’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的根本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由事物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构成”;“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是事物比较深刻、一贯和稳定的方面”等,但马恒通却据此得出了应“在图书馆这一范围内寻找本质”、本质是“先验的”、“不变的”、“唯一的”观点^[51]。显然,在他看来,事物“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即事物的“内部”矛盾。然而,这里所说的事物“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并非事物“内部”的矛盾,所说的事物的“内在联系”也并非事物的“内部联系”,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质探讨来看,并非是局限于事物“内部”范围的。把“本身所固有”的矛盾理解成“内部”的矛盾,或把“内在联系”理解成“内部联系”,并进而认为应“在图书馆这一范围内寻找本质”,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质观点的严重误读。其次,把本质是“一

贯的”、“稳定的”理解成“唯一的”、“不变的”等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质观点的误读。对此,可参考笔者发表的几篇有关图书馆研究中的本质概念及其相关概念的学理分析文章^[52-54],此不赘述。不仅如此,马恒通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对引用的论据也存在不少误读,例如他说:“郭星寿先生曾指出,‘知识信息的传播是图书馆活动的固有其本性或质的规定性,也说明了图书馆的本质是固定不变的。’^[49]“固有”≠“固定不变”,从“A是B的固有其本性”,是不能得出“B的本质是固定不变的”!综上所述可知,马恒通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业内学者本质观点的误读,而陷入了旧唯物论哲学的本质观。

最后,从代表人物蒋永福——反本质主义批判的主将之一——发表的相关论文及其论述看,在他2009年提出“后现代图书馆学”概念以前,一直是我国图书馆理论界对图书馆本质问题探讨最多的学者之一。仅在最近十几年间,就已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发表了相关论文九篇^①,分别从知识组织、知识记忆、知识自由、客观知识以及制度等多角度,对“图书馆是什么”的问题做出了思考与解答,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图书馆本质的认识。特别是他从制度、知识自由角度对图书馆本质的探讨及对相关观念的演绎,在一定范围内引领了近年来的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从他的诸多图书馆本质探索来看,也没有表现出后现代主义学者(包括他自己)所说的“本质主义”的一般特征,更没有导致他自己所说的价值“一元主义”、话语“霸权”、真理“垄断”和“思想专制”等本质主义“元叙事”的“危险的”后果。更为吊诡的是,蒋永福在《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品格》和《不再追

问本质:图书馆学理论的后现代走向》中,一方面对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思维进行批判与颠覆,提出应“放弃对‘元叙事’的制造,不再追问虚幻的图书馆‘本质’”;另一方面,他又对这种批判与颠覆本身提出了质疑,他说:“后现代图书馆学时代,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形而上学思维遭到全面的阻击。”然而,“形上思维真的那么可恶吗?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形上思维真的没有必要了吗?没有了形上思维,图书馆学理论中的批判精神何以显现?没有批判精神的图书馆学研究者难道不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吗?‘单向度的人’进行的‘单向度的研究’,能够给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带来什么福音呢?当我们经常面对‘图书馆学还是一门科学吗’的质问时,难道不感到形上思维的必要吗?”^{[18]②}而他在2007年发表的《理论图书馆学的当代境遇》一文中,更是用近千字的篇幅对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颠覆性挑战”的“本质主义认识传统”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作了专门辩护,明确指出“形而上的”“本质主义决不像后现代主义所诅咒的那样只是‘狂妄的真理话语’”,而“有其后现代主义所不能代替的独特价值”。蒋永福在该文中认为:“本质主义思维就是理性思维。惟理性思维才能把握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东西’”,从而使人能够摆脱“现象的纠缠”和“世俗的烦恼”,“超越工具理性的短视”,“帮助人类寻找精神家园”。因此,对图书馆本质的“永恒追问”,不仅“是理论图书馆学的生命特质所在”,而且“是理论图书馆学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是理论图书馆学的深邃与魅力所在”,“能使图书馆学人保持理性的头脑,以理

① 九篇研究论文是:《图书馆与知识组织——从知识组织的角度理解图书馆学》(《中国图书馆学报》1999年第5期),《图书馆与人类的记忆——从知识记忆角度理解图书馆学》(《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年第2期),《图书馆是什么——图书馆哲学四定律》(《图书馆建设》2002年第5期),《人文图书馆学五定律》(《图书情报工作》2002年第11期),《关于知识自由与图书馆》(《图书馆杂志》2003年第8期),《客观知识·图书馆·人——兼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中国图书馆学报》2003年第5期),《知识自由与图书馆制度——关于图书馆的制度视角研究》(《图书馆建设》2004年第1期),《图书馆与制度公正——制度图书馆学研究》(《图书情报工作》2005年第1期),《理论图书馆学的当代境遇——写在“图书馆学”一词诞生二百周年之际》(《图书馆》2007年第1期)。

② “形而上学”一词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指研究超感觉的、经验以外的对象的哲学;一指与“辩证法”相对应的,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观察世界的思维方式。从蒋永福的论述对象及相关内容看,他是在前一种意义上使用“形而上学”这一概念的。

性战胜浮躁,驻留图书馆学的‘科学’性质”^[55]。但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是,从蒋永福论述的具体语境来看,他所批判的“本质主义”和为之辩护的“本质主义”其实是有一定差别的。前者是后现代的极端反本质主义观点批判的“本质主义”(蒋文正是利用后现代的极端反本质主义观点进行批判的),而后者是一种泛化的“本质主义”(尽管蒋文的这种概括或命名是不妥的,因为“本质研究”并不等同于“本质主义”),似乎包含了所有关于图书馆本质的探索。对这种“名”(名称)“实”(实质)之异的无意识,既是蒋永福先生陷入言说矛盾的重要原因,也为他的言说与行动的两难提供了合理解释。而这种言说矛盾以及言说与行动的两难困境,恰好反映出蒋永福先生既不是纯粹的后现代意义上的本质主义者,也不是彻底的后现代反本质主义者,而是既接受了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理论观点,又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怀抱着现代主义的思维与观念,因而在理论与观念的众声喧哗中失却了自己的理论立场,是游走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图书馆研究者。

综上所述可知,在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除少数研究者因受“理论误读”或其它因素的影响,在本质观念上仍表现出一定的后现代哲学“本质主义”的特征之外,整体上并没有像后现代主义学者所说的那样怀抱着“本质主义”的思想方法。他们在没有对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实际做出必要的考察和“实质性的分析”的情况下,便定性地得出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存在后现代的所谓“本质主义”,并利用后现代的极端反本质主义理论观点对这个所谓的“本质主义”进行批判与颠覆,结果只能是“无的放矢”,是相当错误的。

实际上,自20世纪20年代图书馆学在中国正式确立以来,始终都缺乏本质主义生长的思想文化土壤。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主要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主张社会的变化与发展,主张人的思维方式应该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批判的,而不是宗教化的、教条化的。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流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

点和思想方法,至今都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图书馆学)研究有深刻影响。然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却是19世纪以来最早反对本质主义的理论学说之一。例如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56]马克思还在《哲学的贫困》中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的、变化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永存的,所有的观念和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它们仅仅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显然,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反本质主义的。另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经典作家的本质论述来看,也都是反本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现象与本质的相对性和统一性,认为现象是本质的现象,本质是现象的本质,任何事物都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现象是多变的、易逝的,具有较大的流动性;而本质则是相对平静、相对稳定的,但又并非是凝固的、僵死的,而是发展变化的,因而同样具有时间上的暂时性。所以列宁说:“不但现象是短暂的、运动的、流逝的,只是被假定的界限所划分的,而且事物的本质也是如此。”^[57]因此,应当“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考察事物。”^[58]列宁还认为,不仅事物的本质是变化的,而且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人的思想总是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20世纪80年代后,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启的思想解放运动取得了成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绝对的真理,真理是相对的、发展的”等思想观念深入人心,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也在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中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新理论新观点不断涌现,并呈现出百家争鸣、多元发展的可喜格局。尽管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人们对基础理论探索的热情有所消减,但人们的本质观念和思维方式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更没有完全倒退到后现代主义学者所说的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哲学,以及笛卡尔、康德等人的二元论哲学的水平。可见,脱离20世纪以来中国的特殊历史语境,要想对中国

现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状况做出合乎实际的分析和判断,是非常困难的。

3 后现代学者批判的“本质主义”是何种性质的“本质主义”?

既然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整体上并不存在后现代意义上的所谓“本质主义”问题,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借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观点,来批判我们原本就没有的东西呢?后现代学者批判的所谓“本质主义”,究竟是何种性质的“本质主义”?

认真研读后现代图书馆学者的有关论述可以发现,他们所谓的“本质主义”,其实是与“权力(包括学术权力)”、“权力干预”、“权力话语”、“垄断”、“专制”、“思想专制”、“道德命令”、“统治合法性”等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勾连在一起的。例如,蒋永福在《不再追问本质:图书馆学理论的后现代走向》中阐述“本质主义”、“理性主义”的危害及图书馆学理论后现代走向的必然性时说(引文中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制造图书馆学‘元叙事’,实际上是在制造图书馆学的‘真理’,而制造出来的‘真理’不一定是真理。……所谓‘真理’,其实都是由权力(包括学术权力)生产出来的。……所以,对图书馆学‘元叙事’所追求的‘真理’来说,重要的不在于这种‘真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而在于‘谁在说’、‘谁在建构’。谁是真理的拥有者,谁有权力界定什么是真理?”^[19]

蒋永福认为,“轻易声称自己拥有或掌握真理是危险的”,并以纳粹领袖希特勒为例论证曰:“希特勒当年发出的狂言:‘我宣布我本人及我的继承者在领导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方面拥有政治上不会犯错误的权利’。图书馆学中的‘真理’,可以轻易地被生产,但决不会轻易地被认可;与其生产‘真理’;不如质疑‘真理’。真理难寻,更难确定和垄断(除了权力予以干预)。”^[19]

蒋永福还说:“制造图书馆学‘元叙事’的努力,源于启蒙运动确立的理性主义一元论。”而“理性主义一元论”的“理性狂妄”,“使人类背上了‘致

命的自负’(哈耶克语)枷锁,由此造成了无数人间悲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专制、希特勒的纳粹专制、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专制……”。“理性主义一元论的图书馆学‘元叙事’,其实质是价值一元主义,而价值一元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思想专制——惟我独尊,排斥异己。”^[19]

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三段论述无论是在立论上还是在逻辑上,都是值得商榷的。首先,“绝对真理”是没有的,“相对真理”是存在的。“由权力(包括学术权力)生产出来的”所谓“真理”不一定是“真理”,对理论“真理性”的评判,也不是取决于“谁在说”、“谁在建构”或“谁有权力界定”,而只能取决于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取决于它的内在逻辑的自洽性、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性以及对经验现象的解释力。因此,要特别注意把理论本身的“真理性”与人们利用“权力予以干预”而把某种理论“真理化”和把真理“绝对化”严格地区分开来。

其次,研究者对自己的理论观点的真理性的确信,与政治家为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而把某种理论观点“真理化”、“中心化”进而宣称它为绝对的“真理”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学者声称自己的理论具有真理性,并不会带来“垄断”,也不具什么“危险”,只有那些(像希特勒那样)为了某种政治或其它目的,利用“权力予以干预”而使某种理论“真理化”、“中心化”,才会带来真理“垄断”的“危险的”后果。因此,不能因为“由权力(包括学术权力)生产出来的”所谓“真理”具有危险性,就否定学术研究中真理探索的正当性和可能性。而对于那些能够提出创造性的理论观点的学者来说,他对自己提出的理论观点的“确定性”信念,也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带有贬义的“本质主义”。因为一个有价值并且产生了一定影响的本质观点,对理论家来说不仅牵涉到所谓“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样一个要“坚定地捍卫”的事情,另一方面,即便一个理论家仅把自己信奉的观点作为“普遍的本质”去张扬,而且在张扬中“排斥”其它不同的本质观点,按照戴维·斯沃茨(David Swartz)在解释布迪厄“场域”概念时所说的“场域首先是为了控制有价值的资源而进行斗争的领域”^[59],这种不对等的相互“排斥”是否正常

呢？这就牵涉到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多元化究竟是可以彼此冲突的“场域”，还是一个理想化构筑的“彼此尊重”的世界？这不仅有赖于我们的学术文化中能否建立起“彼此尊重”的社会交往关系和由这样的关系滋生的政治、体制之保障，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只有能够生产出属于自己的创新性理论观点的理论家，才真正懂得尊重另一种理论观点是如何被生产的——在“生产”的意义上，不管什么样的理论观点，都是不容易的、值得被珍视的。为此，我们是否应该对此给予更多的宽容，乃至尊重？

再次，蒋文所说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专制、希特勒的纳粹专制、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专制”等“人间悲剧”，并不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狂妄”的结果，而恰恰是缺乏理性的“专制权力”或“权威政府”借助“意识形态”对社会思想文化进行“专制（思想专制）”的结果。王子舟在述评建国六十年来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时曾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民主政府把科学、理性意见纳入政策的可能性通常要大于威权政府。对于威权政府来说，它有可能听从科学、理性的声音，也有可能不听从，甚至有时更喜欢听从阐释其意志的理论或学说。”^[22]可见，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假如真有“理性主义”的话——更多地是与“科学”、“民主”等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基于理性原则的本质探索，本身并不必然导致“一元论”，更不会导致“专制（思想专制）”的“人间悲剧”。因此，还要特别注意把“理性主义”的后果与“专制（思想专制）”和“权力干预”的后果严格区分开来。更不能倒因为果，掩盖“专制（思想专制）”带来的“人间悲剧”，而否定“理性主义”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的贡献和作用（尽管它自身也有局限性）^①。

另外，在论述图书馆（学）的话语转向时，蒋永福先生又说道：“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型过程中，

人们对图书馆价值的认识发生了一次较明显的话语转向：从‘二战’之前的‘教化—控制’话语到‘二战’后的‘权利保障’话语的转向。”而“‘教化—控制’话语其实是一种权力话语。这种权力话语实际上是统治者担心社会失序心态的产物。……这种话语逻辑是统治者以道德立法者的身份发出道德命令的基本方式。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这种道德命令实际上是为了通过思想专制来生产驯服的身体，为再生产统治合法性‘生产再生产者’。”^[18]

这里，我们暂且不去深究蒋文所谓“话语转向”的观点是否正确，仅仅从它的论述逻辑来看，也是颇有问题的。首先，既然“‘教化—控制’话语”是一种“权力话语”，“是统治者以道德立法者的身份发出道德命令的基本方式”生产出来的，那么，这种话语就不可能是“人们对图书馆价值的认识”的结果，而是统治者“道德命令”即“通过思想专制”的“驯服”的结果，而所谓的图书馆“话语转向”，当然也就不可能是“人们对图书馆价值的认识”的变化而“发生”的。其次，蒋文在对“人们认识发生的结果”与“统治者道德命令产生的结果”缺乏应有的认识和区分的情况下，便把“‘二战’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图书馆的价值主要在于能够帮助普通民众通过阅读优秀读物而改变无知状态，成为有教养的人”，以及“自公共图书馆诞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图书馆是社会教育机构，尤其是杜威把图书馆誉为‘人民的大学’”等论述的实质，看成是“把图书馆的价值定位在上流社会对民众实施道德教化的工具”的观点^[18]，显然就是不充分的，甚至是错误的。实际上，从中外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历史来看，“二战”以前的公共图书馆，恰恰是启蒙运动以来推进民主、启迪民智、普及公共教育等现代观念的产物。所以，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谢拉在《图书馆

① “主义”一词，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的解释，是指“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43页）。可见，“主义”是将一种思想观念“系统化”、“理论化”而不是“绝对化”、“中心化”。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观念的“系统化”、“理论化”而不是“绝对化”、“中心化”。同样，“理性主义”就是理性观念的“系统化”、“理论化”。但从蒋文的论述来看，“理性主义”、“工具主义”中的“主义”一词，更多地被理解成思想观念的“绝对化”、“中心化”了。

学引论》中论述“初期的公共图书馆”时说:“真正的公共图书馆概念是随着 19 世纪初普遍施行公共教育这一观念的产生而出现的。”“信仰民主——相信人民能够独立自主地管理自己,……这比革命战争本身更具有革命性。……《宪法》规定了人民有权参与政府的决策,为了发挥人民的聪明才智,他们必须受到教育。因此,有必要提高选民的觉悟,使其在免费学校制度中受到教育,并自由使用有文字记载的一切知识。这个原则是十分清楚的。”^[60]范并思在《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辩护》一文中也中肯地说道:“以杜威为代表的图书馆学家将图书馆当作一个社会教育机构即‘人民的大学’”,坚信的是“知识应当战胜愚昧,图书馆应该是造就新一代文明领袖和文明国民的有力工具”^[61],而不是“上流社会对民众实施道德教化的工具”。不仅如此,杜威的这一观念还成了“二战”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的基本精神之一。例如该宣言在“人民的大学”(杜威语)一节中写道:公共图书馆“成为一所人民的大学,为所有读者提供义务教育。民主社会的公民需要这种随时进行自我教育的机会,今天复杂多变的生活则使这种需要更为迫切。”^[61]显然,这些“话语”少有蒋文所说的“道德教化”或“教化—控制”的痕迹,而更多地包含着“民主”、“权利保障”之意蕴。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批判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存在“本质主义”思维的学者,其实是把图书馆学理论(包括图书馆本质理论)一直是受时代和文化制约的“可变性”的历史状况,与政治家或理论家借用“意识形态”、“权力(包括学术权力)”、“道德命令”

或“思想专制”等对某种理论观点的“真理化”、“本质化”的超稳定性干预相混淆了。对这种混淆的区分,使得我们应该警惕的主要不是基于理想原则的本质探索,而是“权力(包括学术权力)”和“专制(思想专制)”对理论的“干预”和不正常制约。退一步说,即便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思维——假如真有“本质主义”思维的话——有某种“真理化”、“本质化”的倾向,要改造的也主要不是这种“本质主义”思维,而是把某种特定的理论观点“真理化”、“本质化”的行为和把真理“绝对化”的文化。然而,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存在这种“真理化”、“本质化”意义上的“本质主义”吗?这就需要联系近代以来中国的特殊历史语境,做出具体的考察和分析。

众所周知,作为一门具有现代性的科学学科,图书馆学是伴随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而适时“引进”中国的。中国的广义现代化自近代始,属“外源性”现代化或称“后发外生型”现代化^①。1840 年鸦片战争后,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因列强入侵与军事逼迫,开始走上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道路。洋务运动则把魏源“师夷制夷”的思想发展为“中体西用”,把“西学”仅限制在“用”上。至 19 世纪 80、90 年代,随着西方政治、经济等学说的传入,中国开始重视对西方文化的考察和介绍。作为一种公益性的公众教育机关,欧美新式图书馆(“图书馆”一词亦经由日语转译而来)被视为有助于提高民众智识,提升民族素质,进而有利于富国兴邦之大计而受到重视。加之当时维新派、革

① 从发生源头上看,现代化的启动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我本土的发展而推动的“内源性的”(indigenous)现代化;一种是外部力量推动而发生的“外源性的”(exogenous)现代化。本文所说的“广义现代化”,是指包括“近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两个阶段的“中国现代化”概念。这是因为,“现代”是一个表示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理论性概念,它是与“传统”相对应的。“传统”与“现代”的界分,不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和思想史的分期问题。按此,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始于 17 世纪,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于晚清。因此,20 世纪以来的中国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也不宜分为“近代”和“现代”,因为从源头上看,西方并没有与“近代”相对应的说法,而只用“现代前期”(early modern)表示中文“近代”的意思。中国所说的“现代”,则相当于西文中的“现代后期”(later modern),但西文中又鲜用“现代后期”这一说法,而通常使用“当代”(contemporary)一词。然而,西文中的“当代”通常指整个 20 世纪,而中国所说的“当代”仅指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造成这种不一致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习惯于采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分期来代替学术思想史分期。为消除中西语言障碍,促进学术交流,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有必要回归学术标准,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均把中国“近代”和“现代”图书馆学统称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学”。

命派及清廷学部部分官员的大力推动,逐渐出现了有关建立图书馆的目的、意义以及图书馆与社会、教育、民众意识的关系的论述,“才有了比较完整的图书馆学思想出现”^[62]。1909—1910年,《教育杂志》连载了孙毓修的《图书馆》一书。该书“参考美日的图书馆专书及报告”,“内容已赅括一切图书馆的学术和技术”,“是近代图书馆学的开山之作”,“对‘事方草创,前乏师承’的中国图书馆事业,起了理论启蒙与奠基的作用”^[63]182-183。特别是在19世纪2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确立后,以西方(包括日本)版本为基础的编译、改写或根据西方版本撰写的图书馆学著述不断增多,仅在1925—1938年间,就出版著作达170多种,发表论文计4,000多篇,形成了中国图书馆学史上第一次译介与著述的高潮^[63]44。显然,从“救国兴邦→启迪民智、育新人才→新式图书馆→图书馆学”这样一条需求转化链,表明具有现代性的中国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引进与确立,是与当时的社会状态和政治需要有直接联系的。自此以后,中国图书馆学发展中的“中与外”的关系问题,首先是一个由政治需要决定的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图书馆学术发展选择的产物。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在中国图书馆学的世纪发展过程中,社会状态与政治意识形态始终具有外在的决定性意义,它构成了一个大生态,整体上影响着中国图书馆学的生存状况与发展水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无产阶级政党意识形态的确立,图书馆学进入了批判解放前的“资产阶级思想”时期,也是全面引进苏联图书馆学的时期。中国图书馆学领域发生了“引进”方向即“中与外”关系的第二次整体性转向——从学习欧美转向学习苏联。仅在1953—1956年三年间,便出版了《苏联大众图书馆工作》、《列宁论图书馆工作》等30余种俄文翻译图书^[35]45,并出现了图书馆学作为党的方针、政策解释和革命领袖有关文化建设和图书馆语录的诠释的“意识形态化”现象。特别是在50年代末,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图书馆学领域的展开,图书馆学的知识性和学术性大大降低,而政治性却大大增强。图书馆学理论问题也不再是对已有图书馆知识和观念的逻辑推演,不是

对古今中外图书馆实践经验的提炼,而是对经典权威思想的演绎。正如王子舟所说:“50年代到70年代,政治场域对其他社会场域的全面僭越与宰制,迫使图书馆学研究附庸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与之相唱和,图书馆学界丧失了学术主体的自由精神与独立意识,直接的后果就是图书馆学研究已无学术可言,产出的多是充满了政治味道的革命口号。”^[22]张树华(1980年)在回顾建国三十年的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时 also 说道:“建国初期,为了对旧有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进行改造,提出无产阶级的思想性和阶级性的理论,作为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图书馆工作的指导思想,这在当时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但到后来,逐渐产生一些‘左’的倾向。1959年以后,逐渐引申为‘图书馆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化大革命’中,在‘四人帮’鼓吹的‘全面专政论’的影响下,这个口号逐渐升级,甚至提出了‘图书馆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图书馆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等,把阶级性夸大到荒谬的地步。”^[64]如果说中国图书馆学存在某种具有“本质主义”的特征或思维方式的“理论”的话,那么,当时的图书馆学“理论”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权威思想“本质化”乃至“圣化”的本质主义思维,是当时凌驾一切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在图书馆领域的逻辑推演。在这种叙事模式中,政治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元叙事”,亦即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所说的“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居于所有话语之上,在各种话语中占有绝对优先的、特权的地位,并发挥绝对的主导作用,它是判定一切“是”与“非”、“真”与“假”、“好”与“坏”的最高而唯一的准则,任何知识文化的生产,都只能并且必须遵循这一准则,并由此来决定自身的理论依据、言说立场和话语逻辑,从而获得合法性地位,否则就会被判定为“毒草”、“反动”而遭到排斥,甚至打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图书馆学从恢复到繁荣并开始走向相对独立发展的新时期。图书馆学学科建设不断加强,学术观点趋向多元,学术视野日渐拓展,并建构和形成了图书馆学科的当代体系。不过需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历史地看,20世

纪8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自主性诉求及相当程度的实现,依然借助了它与当时的政治运动——思想解放运动——之间存在的相互支持关系。自主性诉求的批判矛头,指向了“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工具论”图书馆学。可以说,正是自主性诉求赋予了图书馆学研究政治意识形态介入以特殊的合法性。一方面,它借助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而成为图书馆学术探讨中的主流话语,另一方面,它恰恰又是通过淡化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方式来达到意识形态的目的。这种话语转换导致的一个潜在的不良后果,是使许多图书馆学理论家丧失了对于学科自主性的历史反思能力,无法深刻地认识意识形态与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特别是精神的独立性——一直难以得到真正的确立,未能对图书馆学与图书馆事业建设中的现象与问题,做出基于学术逻辑与社会责任的自我表达,而只能在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之下,作亦步亦趋的表述。所以李超平2006年在《我国公共图书馆历史定位之反思》一文中说:“在改革开放以后近20余年来,尽管左右图书馆职业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已基本不再发生,但图书馆界仍然习惯于对国家意识形态的逐波跟风。”“‘跟风’的结果往往导致职业行为对政策的简单图解”,“图书馆职业行为在社会的风向标中的左右摇摆”。“政治话语对图书馆职业话语的控制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出现了图书馆职业话语自觉或不自觉地屈从于政治话语的现象”^[65]。王子舟也说:“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学术自主与独立意识有所恢复,……但从总的情况来看,图书馆学研究受执政党方针政策引力的作用,依然继续围绕着国家政治话语运行,尤其是在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领域。”“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政府理性的逐步回归,图书馆学界也风行起图书馆精神、图书馆核心价值观的话语。这些话语是理性的,值得肯定,但在方法论上它们依然是在做主流意识形态的注脚。……图书馆学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自主、独立的意识,迄今仍没有昂挺起来。”^[22]

综上所述,近百年来,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图书馆学的研究与发展,始终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态,而前者对后者的渗透程度、影响的正负效应,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但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图书馆学研究走上了一条“捣毁传统→重新启动→简单模仿与演绎→初级综合→……”的“推倒式重来”的曲折往复的“发展”路线,不仅使中国图书馆学缺乏自主创新的活力,而且也缺乏应有的学术积累。

显然,那些认为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存在“本质主义”思维,并利用西方后现代的反本质主义理论观点进行批判的学者,其实是因为“历史观”的缺失而犯了“语境抽离”的错误,而这种“中国语境”的“抽离”,又导致了他们对理论批判对象“误置”的无意识。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研究的状况及其问题,不仅不能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判断和分析,反而遮蔽了它的真正“弊端”之所在,因而从根本上无益于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知识生产状况的改观。

当然,后现代主义者之所以有这样的误判,除了上述近现代以来中国“学术与政治”的特殊关系,以及研究者草率地“把后现代思想套用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领域而缺乏实质的分析”(刘兹恒语)有关之外,还可能同本质主义与意识形态在思维方式上具有诸多内在的一致性有关。美国学者劳伦斯·纽曼(W. Lawrence Neumann)曾对“意识形态的理论”和“科学的理论”作了区分,认为“科学的理论”具有的特点是:对问题的回答是有条件的,它的解释不是唯一的,意识到不确定性的存在;愿意根据证据修正理论和接受经验的检验;超越社会立场,保持中立的态度,积极寻求逻辑上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而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具有的特点是:提供绝对肯定的答案,能对所有问题做出回答,并且是不变的;无视对理论不利的证据,回避对理论的检验;坚守某个特定的立场和某种特殊的道德信念,即使充满矛盾或不一致^[66]。可见,“本质主义”与“意识形态的理论”在思维方式上是有诸多内在的一致性的,而这种内在的一致性,决定了

它易于和政治意识形态相联系并为政治意识形态所利用,并进而给学术研究带来某些“危险的”后果。正如我国知名教育学者石中英先生所指出的:“本质主义还容易导致将一些本该加以质疑的观点绝对化、教条化,最终窒息学术讨论的空间。这种现象在政治上的后果就是:如果一种政治信念、原则或决策宣称是建立在对某一对象的本质性、真理性或规律性的认识上,那么同样可以获得道德上的优越性和批评的免疫力,甚至从根本上拒绝理性的质疑和批评,从而为政治生活中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和权威主义打开方便之门。”^[67]

4 后现代主义是否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应然走向”?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研究整体上并不存在反本质主义批判者所简单归结的“后现代”意义上的所谓“本质主义”,但在不同时期却不同程度地存在受意识形态和制度权力制约的把某种特定理论观点作为“中心话语”去贯彻的“本质化”意义上的“本质主义”——如果可以称之为“本质主义”的话。后现代主义学者批判的所谓“本质主义”,其实是受意识形态和制度权力制约的“本质化”行为和倾向,而不是基于理性原则的图书馆本质探索。由此,所谓图书馆学研究应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从本质主义转向反本质主义”,并“彻底摒弃本质观”、“不再追问本质”等立论,也就缺乏应有的前提和逻辑基础。退一步说,即便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存在一定的本质主义的倾向,也不能得出“从本质主义转向反本质主义”,并“彻底摒弃本质观”、“不再追问本质”的结论。这是因为,“反本质主义”反的是作为“思想方法”的“主义”,即后现代主义学者所说的逻各斯主义层面的本质的“主义”,而不是反作为一种“存在”(being)的“本质”。把“本质研究”简单归结为“本质主义”,或把“反本质主义”理解为“反本质”的主义,同样是相当错误的。对此,笔者在《图书馆本质:“实存”还是“虚构”?》一文中已作过初步的逻辑分析^[24],此不赘述。

我国哲学家黄颂杰先生曾经指出:“当代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中西思想文化激荡交融,因而人们对于西方反传统的或激进的概念、主张特别敏感和易于接受。但是,学术思想不像货币或物品那样可以现成地拿取,而是需要消化理解、批判解析、审慎思虑,并运用于实践进行检验。”^[68]后现代主义作为当代全球哲学文化中“反传统”的有影响力的理论,目前在中国图书馆学中正在被一些“特别敏感”的人们迅速地进行着“学术前沿的抢滩”(王子舟语)、并汇流成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后现代思潮”(刘兹恒语)过程中。但从已发表的论文看,很多研究者都只是对后现代主义的相关理论“现成地拿取”,而对这些理论产生、发展与流布的社会文化背景、指涉的对象、基本的学理等,尚缺乏应有的“消化理解”,更缺乏必要的“批判解析”、“审慎思虑”,因而未能结合中国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实际状况,做出合乎历史与逻辑的判断和分析,以至于提出的某些“观点”,颇令人啼笑皆非。例如,在一篇题为《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图书馆学发展的影响》(载《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1年第2期)的论文中,作者声称该文“阐述了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影响”,并认为“詹姆逊理论在中国找到了切入点,通过和国内图书馆学理论的结合,已经产生了理论创新的火花。”然而吊诡的是,该文却是我国图书馆学中首篇介绍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文章。

诚然,在科学研究中,借鉴、移植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非常正常的,这在学科交叉渗透与整合已非常普遍的当下更是如此,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任何借鉴、移植,都必须建立在对所借鉴、移植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必要的学理追问的基础之上。具体而言,就是笔者曾经说过的应“至少要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①移植和运用的学科理论与方法是否适宜于图书馆学本体的‘土壤’?②移植和运用的学科理论与方法是否为图书馆学的发展所需要?③移植和运用的学科理论与方法是否成熟可靠?④移植和运用的学科理论与方法是否同图书馆学具有相关性并在理论层次上可以找到衔接点?”^[69]

若参照这四点来考察后现代主义理论,那么它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移植与应用,显然是缺乏充分的基础的。首先,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并不是很适宜于图书馆学本体的“土壤”。美国研究后现代主义的著名学者波林·罗斯诺(Pauline Marie Rosenau)曾提醒我们:“后现代主义在人文科学、文学和艺术领域的应用或许并没有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是它对于社会科学的适当性是另一种类型的问题。在人文科学领域里主体性和思辨也许是好玩有趣的,但是社会科学应该是更严谨、更具分析性的,它必须把结论建立在理性和此类或彼类证据的基础之上。”^[70]国内研究后现代主义的学者、浙江大学张国清教授也警告:“后现代主义不过是人文科学留给社会科学的一笔糊涂遗产。”“作为一股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尽管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观点、立场和方法,然而它们的影响范围更多地局限在人文科学的领域,并且多以否定性的、消极性的、破坏性的形式而不是肯定性的、积极性的、建设性的形式出现。后现代主义的这一特点也许有助于强化人文科学的批判性功能。相比之下,今天的社会科学的主导功能仍然是建设性的,批判性功能在社会科学中只能是一种辅助功能。(后现代主义)那种摧毁一切、解构一切、无视任何建设性事物的思想倾向和实际行动,显然同社会科学的根本旨趣格格不入。”^[71]可见,源于人文艺术领域的后现代主义,尽管它的某些理论观点可能对图书馆学研究有所启发,但它从根本上却是不适合于社会科学包括图书馆学的。

其次,后现代主义并不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发展所需要。中国现代图书馆与图书馆学是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产物。虽然近百年来已得到很大发展,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建设以后,已基本建立起中国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现代性基础,但是,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我国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现代性均远未完成。从物质层面看,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and 广大人民群众对知识文化的需求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从精神层面看,现代性的核心精神即理性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工具理性)与人文精神(价值理性)——至今仍有待于努力实现。所以于

良芝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职业似乎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症状:如图书馆学研究被斥为‘丑陋’,图书馆学教育被称为‘疲软’;职业话语的严谨性削弱,职业道德的约束力降低;对图书馆职业的忠诚成了‘守望’,……这些症状向我国图书馆职业发出了严峻的警告:她需要从精神到躯体的重建。”^[72]其次,后现代主义作为西方国家现代性相对成熟的产物,对于正全力谋求现代化建设的“后发展国家”中国来说,不仅缺乏现实的物质与思想基础,而且很可能是十分有害的。正如王晓林所说:“现代性和现代化是双向‘反哺’的。作为现代化进程的‘精神积淀’,现代性一经生成,就会转而成为现代化的理性规约和内在张力。后现代社会思潮的实质在于解构和终结现代性,它虽然给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进路提出了某种警示,但却有可能诱发现代化价值合理性危机。”^[73]可见,作为中国现代化一部分的中国图书馆与图书馆学,如果不去注重现代性的培育,而是去幻想一步进入后现代状态,那不但是很幼稚的,而且很可能导致自身发展主题目标的缺失,增加发展进程中的混乱,并最终无益于自身的建设与发展。

再次,后现代主义理论并不是一种相对成熟的理论。后现代主义是针对现代主义的流弊才产生的,它在反对现代主义对于理性、技术的崇拜所造成的同质化、齐一化倾向而导致对于个性、差异性的扼杀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它对本质的理解还停留在两千五百年前柏拉图理论的水平,认为它追求普遍、永恒、二元分割,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看不到本质理论本身就是在发展的,特别是在黑格尔、马克思,以及之后的很多现代哲学流派中,已经扬弃了把事物本质看作是永恒不变的形而上的见解。而认为本质是离不开关系的,是过程的,“本质是设定起来的概念,本质中的各个规定只是相对的”(黑格尔),“它们只是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才有意义”(马克思),并把对本质的认识看作是思维对客体的永不终止的接近过程,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一种思想依据。有鉴于此,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王元骧先生才批评说:“所谓‘反本质主义’完全是由于对本质理论发展的历史缺少理解而提

出的轻率的、并不严肃而科学的观念,我们怎么能把它当作一种经典来供奉呢?”^[74]

综上所述可知,后现代主义不是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应然走向”。

5 结语

本文结合近百年来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与实际,对中国图书馆学中反本质主义批判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揭示了这些观点的立论错误及其原因。然而,从后现代反本质主义批判及其论争这一“事件”来看,它本身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尚存在很多问题与不足。这些问题与不足既体现在批判者身上,也体现在批判对象上。从批判对象上看,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还

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要进一步弘扬图书馆学研究的理性精神(包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着力建构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逻辑相对完整的中国现代图书馆学体系;二是要推进图书馆学术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着力加强图书馆学科的自主性建设。而从批判者身上看,则是要在理论反思与批判的同时,进一步把反思与批判的对象指向自身,从而使自己能够在理论的反思与批判中有真正的发现与提高。然而,这对于长期习惯于捡拾国外学术成果的“面包屑”、热衷于追踪社会政治与文化“流行话语”而疏于基本理论的深度思考的中国图书馆学研究者来说,这种理性精神与自主意识的培育及自我反思与批判能力的养成,又何尝不是一项十分紧迫、艰巨而又长期的任务!

参考文献

- [1] 廖腾芳. 构筑哲学基础上的后现代图书馆[J]. 图书馆学研究, 2004(8): 5-7. (Liao Tengfang. Building the post-modern library based on the philosophy [J]. Researches in Library Science, 2004(8): 5-7.)
- [2] 赵庆禹, 陈艳华. 后现代图书馆及其主要特征散论[J]. 情报资料工作, 2006(1): 24-26. (Zhao Qingyu, Chen Yanhua. The postmodern library and its features[J].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ervice, 2006(1): 24-26.)
- [3] 邵畅. 后现代文化对图书馆建设的影响[J]. 四川图书馆学报, 2008(2): 5-8. (Shao Chang. The influence of post-modern cultur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ies[J]. Journal of the Library Science Society of Sichuan, 2008(2): 5-8.)
- [4] 梁灿兴. 不可或缺的黯淡蓝点——图书馆后现代浪潮中的现代性[J]. 图书馆, 2009(4): 1-4. (Liang Canxing. Indispensable dim blue point——Modernity in library of the post-modern wave [J]. Library, 2009(4): 1-4.)
- [5] 谭楚子. 后现代语境下的休闲文化与图书馆功能嬗变[J]. 图书与情报, 2008(1): 34-39. (Tan Chuizi. Transmutation of public library function and leisure culture under post-modernism context[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2008(1): 34-39.)
- [6] 万进. 信息技术语境下高校图书馆文化自觉价值取向的主体间性诉求: 一种后现代的检视[J]. 图书馆, 2009(2): 38-39, 43. (Wan Jin. Inter subjectivity dimension of cultural value orientation of academic library: A post-modern perspective in the info-technology context[J]. Library, 2009(2): 38-39, 43.)
- [7] 徐妹, 张雪艳. 论后现代视阈下高校图书馆文化功能的定位与发展[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12(2): 12-15. (Xu Mei, Zhang Xueyan. Analysis on ori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func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y in the context of post-modernism[J]. Library Work and Study, 2012(2): 12-15.)
- [8] 秦小丽. 后现代性的有机主义与图书馆服务理念[J]. 图书与情报, 2005(6): 19-22. (Qin Xiaoli. Organism of post-modernity and library service concept[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2005(6): 19-22.)
- [9] 孙淑华. 后阅读时代大学生经典名著的阅读现状及对策[J]. 图书与情报, 2010(4): 132-134. (Sun Shuhua. Post-modern reading the classics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to read and countermeasures[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2010(4): 132-134.)
- [10] 吴萌, 来玲. 后现代主义课程观下的检索课教学模式创新[J]. 情报杂志, 2008(4): 154-156. (Wu Meng, Lai

- Ling. The innovated teaching mode of the information retrieval on the viewpoints of the post-modernism course concept [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2008(4): 154-156.)
- [11] 俞传正. 现代性、后现代性与公共图书馆职业[J]. 图书馆, 2011(5): 1-3. (Yu Chuansheng. The public library between the modernity and the emerging post-modernity[J]. Library, 2011(5): 1-3.)
- [12] 俞传正. 后现代视角下图书馆职业的重新解读与省思[J]. 图书馆建设, 2012(9): 1-4. (Yu Chuansheng. Reinterpretation and reflection of the library profession from the postmodern perspective[J]. Library Development, 2012(9): 1-4.)
- [13] 袁月. 知识考古学视域下的图书馆史观[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1(6): 103-107. (Yuan Yue.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udy on library from the angle of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11(6): 103-107.)
- [14] 陈立华. 现代图书馆学的实践论与后现代主义理论范式的冲突及延续[J]. 图书馆杂志, 2010(9): 9-11. (Chen Lihua. Conflict and extension of modern library science on practice and latter modernism theory model[J]. Library Journal, 2010(9): 9-11.)
- [15] 邱景华. 后现代理论与中国图书馆学[J]. 图书馆杂志, 2011(9): 7-11, 39. (Qiu Jinghua. Postmodern theory and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Journal, 2011(9): 7-11, 39.)
- [16] 王平. 国内外后现代主义哲学与图书情报学研究的述与思[J]. 图书情报工作, 2010(13): 22-26. (Wang Ping. Reviews and thoughts on philosophy of postmodernism an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2010(13): 22-26.)
- [17] 傅荣贤. 论当代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转变[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9(1): 23-29. (Fu Rongxian. On the research paradigm shift of contemporary library science[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09(1): 23-29.)
- [18] 蒋永福. 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品格[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09(4): 23-29, 69. (Jiang Yongfu. Character of the theory of postmodern library science[J]. Journal of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2009(4): 23-29, 69.)
- [19] 蒋永福. 不再追问本质: 图书馆学理论的后现代走向[J]. 图书情报工作, 2010(1): 5-7, 90. (Jiang Yongfu. No longer questioning the nature: The postmodern trend of the library science theory[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2010(1): 5-7, 90.)
- [20] 徐跃权. 论图书馆本质的哲学解构与建构[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0(5): 23-33. (Xu Yuequan. On philosophical de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essence[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0(5): 23-33.)
- [21] 马恒通. 一部标新立异的图书馆学专业教材——读蒋永福的《图书馆学通论》[J]. 图书馆学刊, 2010(9): 1-3. (Ma Hengtong. A novel textbook of library science: Review of *The General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by Jiang Yongfu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2010(9): 1-3.)
- [22] 王子舟. 建国六十年来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J]. 图书情报知识, 2011(1): 4-12, 35. (Wang Zizhou. Sixty years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J]. Document,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2011(1): 4-12, 35.)
- [23] 刘兹恒, 周佳贵. 论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科学化[J]. 图书馆论坛, 2011(6): 38-44. (Liu Ziheng, Zhou Jiagui. O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scientizing of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Tribune, 2011(6): 38-44.)
- [24] 刘君. 图书馆本质: “实存”还是“虚构”?——图书馆本质研究之一[J]. 图书馆杂志, 2012(4): 2-6. (Liu Jun. Library essence: “Realism” or “Nihilism”?——Library essence research series No. 1 [J]. Library Journal, 2012(4): 2-6.)
- [25] 刘君. 为何追问本质: 图书馆本质追问的正当性辩护——图书馆本质研究之二[J]. 图书馆杂志, 2012(5): 7-10, 44. (Liu Jun. Why we seek the essence: A legitimate pleading of library essence research——Library essence research series No. 2 [J]. Library Journal, 2012(5): 7-10, 44.)
- [26] [美] 艾尔·巴比. 社会研究方法[M]. 第10版. 邱泽奇,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6. (Babbie E.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M]. 10th ed. Qiu Zeqi, Trans.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05: 6.)

- [27] [英]乔治·爱德华·摩尔. 伦理学基础[M]. 长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1. (Moore G E. Principia ethica [M]. Changhe,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1.)
- [28] [美]理查德·罗蒂. 后哲学文化[M]. 黄勇,编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158. (Rorty R. Post-philosophy culture [M]. Huang Yong, Compi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2: 158.)
- [29] 王子舟. 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Wang Zizhou. Du Dingyou and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M].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2002.)
- [30] 杜定友. 图书馆管理法上之新观点[J]. 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 1932(9): 23-28. (Du Dingyou. A new point of view on library management [J]. Zhejiang Library Monthly, 1932(9): 23-28.)
- [31] 刘国钧. 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G]//中国图书馆学会. 百年文萃:空谷余音.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5: 24-26. (Liu Guojun. On the attributes and functions of early modern library [G]//Library Society of China. Classic works in one hundred years: The hollow echoes. Beijing: China City Press, 2005: 24-26.)
- [32] 刘国钧. 图书馆学要旨[M]. 上海:中华书局, 1949. (Liu Guojun. The main idea of library science [M].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49.)
- [33] 杨昭愬. 图书馆学[G]//中国图书馆学会. 百年文萃:空谷余音.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5: 33-37. (Yang Zhaoze. Library Science [G]//Library Society of China. Classic works in one hundred years: The hollow echoes. Beijing: China City Press, 2005: 33-37.)
- [34] 黄宗忠,彭斐章,谢灼华. 对图书馆学几个问题的初步探讨[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1963(1): 104-120. (Huang Zongzhong, Peng Feizhang, Xie Zhuohua. A discussion of a few issues of library science [J]. 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Humanities, 1963(1): 104-120.)
- [35] 黄宗忠. 图书馆学导论[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Hung Zongzhong.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M].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1988.)
- [36] 黄宗忠. 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定义、功能的新思考[J]. 图书馆论坛, 2003(6): 4-12. (Hung Zongzhong. New thinking on the object, definition and function of library science [J]. Library Tribune, 2003(6): 4-12.)
- [37] 周文骏. 什么是图书馆?怎么研究图书馆学?[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8(5): 2-4. (Zhou Wenjun. The library and library studies [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08(5): 2-4.)
- [38] 周文骏. 图书馆是社会的产物[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0(5): 5-9. (Zhou Wenjun. Library is social creature [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10(5): 5-9.)
- [39] 周文骏,杨晓骏. 文献的属性、现象和本质[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2): 76-82. (Zhou Wenjun, Yang Xiaojun. On the attributes, phenomena and essence of literature [J].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1994(2): 76-82.)
- [40] 吴慰慈,邵巍. 图书馆学概论[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 41-43. (Wu Weici, Shao Wei.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M]. Beijing: Bibliographic Press, 1985: 41-43.)
- [41] 吴慰慈,董焱. 图书馆学概论[M]. 修订2版.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4: 1. (Wu Weici, Dong Y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M]. 2nd ed.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04: 1.)
- [42] 吴慰慈. 图书馆学基础[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27. (Wu Weici. The basis for library science [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4: 27.)
- [43] 宓浩. 图书馆学原理[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Mi Hao. The principles of library science [M].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88.)
- [44] 黄纯元. 追问知识的本质——对知识交流论的再思考[J]. 图书馆杂志(理论学术年刊), 1998: 1-24. (Huang Chunyuan. Questioning the essence of knowledge: Study again on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J]. Library Journal: Theoretical Academic Annual, 1998: 1-24.)
- [45] 徐引篪,霍国庆. 现代图书馆学理论[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18-19. (Xu Yinchu, Huo Guoqing. Modern library science theory [M].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1999: 18-19.)

ern library science theories[M].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1999: 18-19.)

- [46] 于良芝. 图书馆学导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17. (Yu Liangzhi.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3: 17.)
- [47] 王子舟. 图书馆学基础教程[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Wang Zizhou. Basic course of library science[M].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48] 王子舟. 图书馆学是什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48. (Wang Zizhou. What is library science[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48.)
- [49] 马恒通. “研究对象”之争源于仍未准确揭示其“本质”——与周久凤先生商榷[J]. 图书馆, 2009(6): 63-64, 76. (Ma Hengtong. The controversy about “library science study object” from not accurately reveal the essence of library [J]. Library, 2009(6): 63-64, 76.)
- [50] 马恒通.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确定[J]. 图书情报工作, 2002(6): 42-47. (Ma Hengtong. On the forming of the study object of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02(6): 42-47.)
- [51] 马恒通. 知识传播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新探[J]. 图书馆, 2007(1): 15-21. (Ma Hengtong. The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theory: A new probe into the study object of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2007(1): 15-21.)
- [52] 刘君. 本质是什么: 图书馆研究中的本质概念浅析——图书馆本质研究之五[J]. 图书馆杂志, 2012(8): 2-9. (What essence is: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essence in library research——Library's essence research series No. 5[J]. Library Journal, 2012(8): 2-9.)
- [53] 刘君. 错位的本质: 图书馆本质及其相关概念辨析——图书馆本质研究之六[J]. 图书馆杂志, 2012(9): 15-22. (Liu Jun. Mal-positional essence: A semantic discrimination between library essence and its relative concepts——Library essence research series No. 6[J]. Library Journal, 2012(9): 15-22.)
- [54] 刘君. 迷惘的本质: 图书馆本质若干元问题辨析——图书馆本质研究之七[J]. 图书馆杂志, 2012(10): 2-11. (Liu Jun. Perplexing essence: An analysis of meta-questions of library essence——Library essence research series No. 7 [J]. Library Journal, 2012(10): 2-11.)
- [55] 蒋永福. 理论图书馆学的当代境遇——写在“图书馆学”一词诞生二百周年之际[J]. 图书馆, 2007(1): 1-5. (Jiang Yongfu. Theoretical library science in the contemporary circumstances[J]. Library, 2007(1): 1-5.)
- [56] 黎澍.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4: 128. (Li Shu. Historical science research of the classical writers of Marxism[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64: 128.)
- [57] 中共中央编译局. 列宁全集·第5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213.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Complete works of Lenin (Vol. 55)[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0: 213.)
- [58] 中共中央编译局. 列宁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419.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Selected works of Lenin (Vol. 4)[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5: 419.)
- [59] [美]戴维·斯沃茨. 文化与权力——布迪厄的社会学[M]. 陶东风,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142. (Swartz D. Culture and power: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M]. Tao Dongfeng,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6: 142.)
- [60] 袁咏秋, 李家乔. 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205. (Yuan Yongqiu, Li Jiaqiao. Selected readings of foreign classics in library science[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205.)
- [61] 范并思. 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辩护[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4(2): 5-11. (Fan Bingsi. A modern defense of the spirit of public library[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4(2): 5-11.)
- [62] 谢灼华. 《晚清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史》序[M]//程焕文. 晚清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史.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5-9. (Xie Zhuohua. Preface of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Library Ideas in Later Qing Dynasty*[M]//Cheng Huanwe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Library Ideas in Later Qing Dynasty.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04: 5-9.)

- [63] 范并思. 20世纪西方与中国图书馆学——基于德尔斐法测评的理论史纲[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Fan Bingsi. Library science in western world and in China: A historical outline of library science theory based on the Delphi Survey [M].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04.)
- [64] 张树华. 三十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和今后的任务[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1(1): 85 – 93. (Zhang Shuhua.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and the tasks in the future[J].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1981(1): 85 – 93.)
- [65] 李超平. 我国公共图书馆历史定位之反思——兼评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J]. 图书馆, 2006(5): 1 – 4. (Li Chaoping. Reflect upon the historical fixed position of public library of our country: And comment on new library movement of the 21st century[J]. Library, 2006(5): 1 – 4.)
- [66] [美]劳伦斯·纽曼. 社会研究方法:定性与定量的取向[M]. 郝大海,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54.
(Neuman L.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5th ed)[M]. Hao Dahai, Tran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7: 54.)
- [67] 石中英. 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与中国教育研究[J]. 教育研究, 2004(1): 11 – 20. (Shi Zhongying. Essentialism, anti-essentialism and pedagogic study in China[J]. Educational Research, 2004(1): 11 – 20.)
- [68] 黄颂杰. 实体、本质与神[J]. 哲学研究, 2008(8): 91 – 96. (Huang Songjie. Entities, nature and god[J]. Philosophical Researches, 2008(8): 91 – 96.)
- [69] 刘君,彭宏炯. 图书馆学学科建设需要着力处理好四个关系[J]. 图书情报工作, 2001(6): 16 – 20. (Liu Jun, Peng Hongjiong. The four relations in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01(6): 16 – 20.)
- [70] [美]波林·罗斯诺.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M]. 张国清,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251. (Rosenau P M.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M]. Zhang Guoqing,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8: 251.)
- [71] 张国清. 译者前言[M]//[美]波林·罗斯诺.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 张国清,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1 – 7. (Zhang Guoqing. Preface of translator [M]//Pauline Marie Rosenau.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Zhang Guoqing,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8: 1 – 7.)
- [72] 于良芝. 未完成的现代性:谈信息时代的图书馆职业精神[J]. 图书馆杂志, 2005(4): 3 – 7, 20. (Yu Liangzhi. Unfinished modernity: Core values of library profess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J]. Library Journal, 2005(4): 3 – 7, 20.)
- [73] 王晓林. 现代化不能拒斥现代性——兼论应对西方后现代社会思潮的挑战[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6(3): 25 – 29. (Wang Xiaolin. Modernization cannot refuse modernity: And on the countermeasures to the challenge of western postmodern ideas[J].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 P. C. , 2006(3): 25 – 29.)
- [74] 王元骧. 关于文学理论的性质和功能的思考[J]. 文学评论, 2012(3): 191 – 199. (Wang Yuanxiang. On the nature and functions of literary theory[J]. Literary Review, 2012(3): 191 – 199.)

刘 君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系教授。通讯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邮编:550025。

(收稿日期:2013 – 04 – 26;修回日期:2013 – 05 – 27)